

消失的憤怒——日治晚期藤澤苜 的原住民心理學實驗

巫毓荃*

昭和十年到十三年，臺北帝大心理學教室助手藤澤苜以臺灣原住民為對象，進行一個憤怒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其實驗假設認為原住民心理「孩童似的」且「感情中心」，容易出現憤怒的爆發。然而藤澤苜最終未能證明其假設，所有接受實驗的原住民都未出現憤怒的發作。

以藤澤苜就此實驗發表的論文與雜記為對象，本文將其放在殖民脈絡中予以批判性的檢視。據此論證心理學者對於原住民心理的研究與論述，並不只是一種知識興趣，同時也是殖民政治的一環。就藤澤苜的實驗而言，其選擇憤怒為研究對象，反映出殖民者對於原住民武力反抗的戒懼與解釋。強制性的實驗參與、實驗者作為殖民權力象徵的在場、以及實驗本身所設計的挫折情境等，則使整個實驗體現了殖民權力的運作。至於藤澤苜對於實驗結果的詮釋，更反映出一種普遍見於殖民「人的科學」研究中的忽略，使研究者無法正視殖民權力才是形塑被殖民者主體的主要力量，而自己同時作為研究者與殖民者的在場，則決定了被實驗者的行動。

此外，藉由藤澤苜所留下來的原始紀錄，我們還可將被實驗者的行動詮釋為憤怒的轉化，而可看到被殖民者在與殖民者的對峙中所潛藏的族群認同。在宣稱成功的同化政策下，其實隱藏著一個壓抑、偽裝的憤怒自我。

關鍵詞：藤澤苜 飯沼龍遠 丹波 取花實驗 霧社事件 臺灣原住民

* 天主教耕莘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昭和十年(1935)至十三年(1938)，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教室助手藤澤苜曾以臺灣原住民各族為對象，進行一個社會心理學實驗。該項實驗設計原本以原住民的「憤怒」為研究對象，但由於無法獲得預期的結果，藤澤轉而從原住民「行動特性」與「文化民族性格」等角度，詮釋實驗所得的資料，並發表一系列論文於《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日本《心理學研究》及《民族學研究》等專書或期刊。有別於殖民時期其它原住民心理學研究，幾乎都是以智能的測定與比較為主題，藤澤苜針對原住民情緒與社會行動的研究，一方面反映出殖民者除了認定原住民智能發展落後外，他們對於原住民還有著其他深沈的偏見與戒懼；另一方面，由於實驗性質的緣故，在情緒的實驗中，我們也可觀察到實驗者與被實驗者之間，發生更多外顯或潛藏的互動關係。本文將把這項實驗重置於殖民脈絡中加以檢視，包括實驗的假設、設計、進行以及實驗者的詮釋等。此外，不同於藤澤苜從原住民「種族心理特性」的角度，所作出對於原住民行動與憤怒的心理學解釋，以他所留下的實驗記錄為基礎，本文將嘗試提出另外一種歷史學式的分析。

檢視這些史料之前，有必要先針對藤澤苜所屬的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教室，作一些背景的說明。事實上，藤澤苜對於原住民心理的興趣，並不是當時教室成員的特例。相反地，在帝大心理學講座終戰前可考的學術活動中，臺灣原住民一直是最主要的研究對象。對於日籍心理學者這一特定的知識興趣與研究取向，以下將作簡單整理並提出一些分析的角度。

一、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教室與民族心理學研究

心理學教室為帝大文政學部最早成立的七個講座之一。從 1928

年一直到 1945 年殖民統治結束，曾在心理學教室進行研究與教學的心理學者，總共有三人。1928 年成立時，教室成員為教授飯沼龍遠、助教授力丸慈圓與助手藤澤苜(1929 年來臺)。1941 年飯沼退休，力丸昇任教授，藤澤昇任助教授，並未再有新血加入。專攻心理學的畢業生人數並不多，在殖民時期總共只有三人畢業，分別為中川彌一(1931 年)、櫻林仁(1941 年)與田島直治(1942 年)，另外還有一位早阪泰次郎於 1943 年入學，戰後返回東京大學完成學業。¹

如此有限的人力，卻仍舊留下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其中，幾乎所有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都是以原住民心理為研究主題；²而且幾位心理學者在各種不同場域所發表的演講與雜文，也有相當比例在討論原住民心理的問題。例如，在臺北帝大的研究年報中，飯沼等三人曾發表一系列原住民心理學測驗與實驗的結果，當中雖有部分牽涉到內、本、番三族的比較，但是顯而易見地原住民才是他們一貫的研究主軸。此外，飯沼龍遠曾受理番當局邀請於理番幹部講習會上講授原住民心理的特徵，並於 1933 年與 1936 年將講稿全文〈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與〈蕃人の心理〉刊載於《理蕃の友》上，供所有理番警察閱讀參考。而在大學空間的配置上，1928 年底開始設計規劃的心理學教室，與土俗人種學教室分居同一建築的一、二樓，雖然無從了解當初決策的過程，但這可能反映了當時心理學研究的特色。而且依宮

1 邱景墩，〈文政學部——哲學科簡介〉，《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臺北，1996)，頁 99-137。另可參見莊仲仁，〈臺大心理學系系史——創系前的「臺北帝國大學心理學講座」階段(1928-1944 年)〉，website: www.psy.ntu.edu.tw/alumni/1.history.htm#his1。

2 殖民時期心理學講座成員發表學術論文的場域，主要是《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哲學科》，還有藤澤苜曾發表一篇論文於日本《心理學研究》期刊。所有論文主題幾乎都是原住民心理研究。

本延人的回憶，兩個教室成員確實有著密切的互動與交流。³因此，當戰後臺大心理學系鄭發育教授發表其有關臺灣原住民心理的研究成果時，就將這樣一個研究主題，視為傳承自殖民時期日籍心理學者的學術傳統。⁴

然而，不同於人類學原本就有以「原始民族」為主要研究對象之傳統，在心理學相對多元的次領域中，這些心理學者為何捨棄一般行政區輕易就可找到的受試者，而遠赴番地一族一族地進行實驗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因素來加以解釋。

首先，就學科內部的理論脈絡而言，臺灣原住民可以說是民族心理學極佳的研究樣本。當時所謂的民族心理學，是由實驗心理學始祖威廉·馮特 (Wilhelm Wundt) 所提出的一種研究取徑。在馮特的心理學體系中，民族心理學與動物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同屬「發展心理學」領域。換言之，相對於個人心理學以文明成人心理為研究對象，民族心理學針對未開化民族心理所作的研究，其實是要以前者做為參考點，透過二者間的比較來勾勒人類心理發展的軌跡。在馮特的計畫中，他希望藉由對動物、兒童與未開化民族的系統性研究，補充個人心理學的不足，以建立關於物種、個人與民族心理發展的完整理論。⁵

³ 宮本延人，《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1998)，頁 47-55。

⁴ 鄭發育，〈高山族的色彩好惡〉，《臺灣風物》，2：2(臺北，1952)，頁數 4-5。

⁵ Wilhelm Wundt, translated by Edward Leroy Schaub, *Elements of Folk Psychology: Outlines of a Psychological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此處的 folk psychology 為德文 *Völkerpsychologie* 的英譯，也有人譯為 *ethnopsychology*，但 folk psychology 與 *ethnopsychology* 二者後來各有不同的發展，以致意義並不相同，也與馮特的 *Völkerpsychologie* 有所差異。另可參見桑田芳藏，〈ウントの民族心理學と近時の心理學思想〉，《心理學研究》，2(東京，1927)，頁 1051-1059；城戶幡太郎，〈聯想及び想像の民族的研究——主としてト

從民族心理學的提問出發，一方面，其究極的對象仍是文明成人心理的發展過程，而非未開化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就未開化民族的心理特性而言，民族心理學則是強調從整體人類心理發展的角度，依其與發展頂峰亦即文明成人心理的落差，界定其所屬的發展階段。綜觀日治時期心理學者所作的研究及所發表的言論，大多屬於此一學術脈絡。例如，他們以「型態盤」⁶對原住民各族所作的智能測驗，雖然也曾提到社會文化生活所造成的民族特殊性，但是整體而言仍是從「未發展—發展」的角度，看待未開化民族與所謂文明心理間的差異。⁷有趣的是，日籍心理學者關於原住民心理發展位階最直接也最系統性的論述，並非出現在學術論文，而是出現在飯沼龍遠兩次於理番幹部講習會中授課的內容。

在這兩次演講中，飯沼曾引用多種心理發展理論，來界定臺灣原住民所屬的發展位階。例如，在馮特以社會組成的差異所區分的：

- (1)原始人時代
- (2)圖騰時代
- (3)神及英雄時代
- (4)人的時代

四個發展階段中，飯沼認為臺灣原住民大部分處於以氏族為社會組成的最大單位，以靈魂信仰、禁忌與卜筮為行動指導原則的圖騰時代，

筮發達の方面より観たる考察》，《心理研究》，12(東京，1917)，頁150-172；城戸幡太郎，〈心理學に於ける民族的研究の方法に就いて——聯想及び想像の民族的研究，その二〉，《心理研究》，12(東京，1917)，頁501-523。

⁶ 將數種特定型態(如十字、長方、四角、圓形、星形等)分割成數小片，請受試者以這些分割的小片組合出原本的型態。為智力測驗的一種形式。

⁷ 飯沼龍遠，〈形態盤成績の民族的相違〉，《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哲學科》，4(臺北，1937)，頁341-420。

少部分則進入到初具國家雛形，並逐漸發展出個人、階級與社會分工等意識之神及英雄時代。⁸他還曾引用另一個發展理論，這是以物種進化的生物重演律(recapitulation law)⁹為基礎，將人類心理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包括：

- (1) 下等哺乳類時代(一個月大嬰兒)
- (2) 高等哺乳類時代(半歲大幼兒)
- (3) 原始人時代(一歲大幼兒)
- (4) 自然人時代(五歲大兒童)
- (5) 原始文化時代(小學校兒童)
- (6) 文明人時代(中學時代青年)

其中，飯沼認為臺灣原住民處於開始具有文化意識與現實生活意識，並稍能克制自身衝動以完成被強制義務的原始文化時代。¹⁰至於就認知能力而言，他則認為在：

- (1) 原始期——混沌狀態
- (2) 型態期——能在混沌背景中，綜合地把握目的觀念
- (3) 分化期——能夠對於綜合目的觀念進行局部的分析理解

三個發展階段中，原住民的認知能力處於原始期與型態期之間的時

⁸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二)〉，《理蕃の友》，昭和8年12月號(臺北，1933)，頁3-4。

⁹ 德國胚胎學家海克爾(E. Haeckel, 1834-1919)所提出的生物重演律(Recapitulation Law)，認為個體胚胎發育過程是其種系長期進化過程的縮影，例如所有的脊椎動物(包括人類)在其早期胚胎的發育階段都出現尾巴和鰓囊。在發展心理學中，這個假說被擴大為不但個體胚胎發育過程在某個程度上是種系進化過程的簡單重演，而且人類個體的學習與創造過程在某個程度上也是人類整體知識和文化進化過程的簡單重演，且兩者(生物的重演和人類知識與文化的重演)間具有平行同構的關係。

¹⁰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中)〉，《理蕃の友》，昭和11年8月號(臺北，1936)，頁2-3。

期。¹¹

如此不厭其煩地反覆定位臺灣原住民的發展位階，除了這是民族心理學一貫的理論取向之外，從飯沼發表演講的場合來看(理番幹部講習會)，我們還必須思考在殖民統治上，此類論理所能起到的作用。這即是可能促使日籍心理學者熱衷原住民心理研究的第二個因素：理番的需求。

事實上，即使在較早的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政府也從未忽視「番情」理解對於理番的重要性。包括理番行政系統中「番情」蒐集機制的建立、對於所謂「番通」的倚重、伊能嘉矩等人類學家的調查研究，以及陸續成立的「番情研究會」、「舊慣調查會」與「番族調查會」等調查機關，都是知識／權力機制在臺灣原住民統治的展現。¹²其目的則是「樹立以對於番人種族、社會組織、慣習、性能、生活狀態、親族關係、宗教等之正確理解為基礎的理番方針。」¹³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後，一方面，殖民者將事件歸因於部分理番警察素質不良所激起的反抗；另一方面，「番情」機制的失靈，特別是第一線警察官在幾年平穩的番地情勢後，逐漸輕忽番情理解的重要性，則被認為是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1931年公布的「理番政策大綱」第二項中，就再次重申「理番應該以對番人的正確理解，並以番人實際生

¹¹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中)〉，頁3。

¹² 參見陳偉智，〈殖民主義、「蕃情」知識與人類學——日治初期臺灣原住民研究的展開 1895-190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8)，頁41-57。

¹³ 參見「理番政策大綱」第二項大綱。其中提到基於對番人的理解樹立理番方策，向來都是當然必須要做的事，早期也有良好的實行與結果。全文文獻可參考：鈴木作太郎，《臺灣蕃族研究》(臺北：臺灣史籍刊行會，1932)，頁495-505。

活為基礎，樹立其方策。」¹⁴

應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飯沼成為理番幹部講習會的講師。就理番的需求而言，心理學者的介入，可以在原有番情調查與人類學研究之外，提供理解原住民深層心理結構的知識，以作為原住民統治的參考。而對心理學者而言，他們所進行的原住民研究，除了回答自己學術領域所設定的問題之外，同時也嘗試為殖民統治遭遇的困境提供建言。因此，這樣的研究旨趣不只是學術的，同時還帶有政治性。在飯沼龍遠的兩篇演講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學術與殖民政治密不可分的關連。一方面，這是日治時期心理學者對於原住民心靈最系統性的描述與剖析，另一方面，它們也是心理學者對於統治技術的反省與建議。

二、心理發展的系譜

整體而言，飯沼在演講中嘗試回應的是當時理番事業遭遇的兩個困境。第一個困境是殖民者自己對於理番目標的質疑。早在殖民初期，有關教化或同化臺灣原住民的可行性就存在許多爭議。其中有一類意見，認為原住民與禽獸無異，主張讓其漸進滅絕，或至少不應試圖改變其原始的生活型態。霧社事件後，或許在強烈的挫折感與仇恨驅使下，類似認為原住民不可能進化，從而主張放棄同化政策並「全滅」原住民的聲音，再次於理番警察間盛行流傳。¹⁵無疑地，這與既定的理番方針不符，不但造成政策執行不力的問題，也可能激化更多的衝突。對此，飯沼在兩次演講中，都以心理學知識為理番政策背書。

¹⁴ 鈴木作太郎，《臺灣蕃族研究》，頁 495-505。

¹⁵ 近藤正己著，張旭宜譯，〈臺灣總督府的「理蕃」體制與霧社事件〉，《臺北文獻》，111(臺北，1995)，頁 180。

他從心理發展的角度，肯定並強調教化與同化目標的可行性。首先，飯沼肯定原住民與文明人在物種上的相近性，駁斥一些認為原住民「半人半獸」，不可能進化為真正人類的說法。他認為二者的差別，並不是人與獸的物種差別，而只是「現實發展」的差異。換言之，他認為二者其實有著相似的精神素質，只是受到環境的影響，才造成發展程度的落差。他還引用藤澤苜的話說：「就比較不受到教育與經驗影響的知能素質而言，依據我們的調查，〔番人〕與歐洲人等人種比較起來，並不會低劣太多，只是在經驗上所受過的磨練太少而已。」¹⁶

其次，對於原住民某些「特異」的心理現象，這些文明人眼中「非常難以理解的謎樣存在」，¹⁷飯沼則是藉著將其還原為理智、感情、意志等基本心理向度，為殖民者提供了比較理解的理論基礎。例如，原住民的固執迷信，文明人經常嘲笑其是「毫無意義」的信念，並以此認定原住民是「愚劣」的人種。¹⁸但是飯沼卻認為就心理學角度而言，迷信是極為有趣且有待研究的對象。他指出迷信的心理機制，是「由於感情的作用，而把沒有因果關係的事物，想成有因果關係的事物」；¹⁹而且由於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的心理作用，某些迷信並不是完全沒有實效的信念。再者，同樣的迷信心理也存在於文明人。因此，只要能瞭解心理的機制，將其還原為所有心理共通的向度，原住民的心理就不再是個難以理解的謎，而與文明人心理同屬一個發展系譜。二者間的連續性，不但使其成為可被理解的存在，而且它們之間的距離，似乎也不再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差距。飯沼認為「現實發展」的差異，

¹⁶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一)〉，《理蕃の友》，昭和8年11月號(臺北，1933)，頁3。

¹⁷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一)〉，頁3。

¹⁸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一)〉，頁3。

¹⁹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一)〉，頁3。

就像是同類種子在不同環境生長後所發展出的不同型態，²⁰只要提供適當的環境，原住民也能發展出與文明人類相似的心理。此外，他還指出由於臺灣原住民仍處於社會文化意識及民族意識尚未完全發展的階段，因此同化他們為日本民族的目標，或許還會比同化臺灣漢人更為容易達成。²¹

乍看之下，飯沼的論點似乎對於被殖民「他者」有著較為同情的理解，並且在殖民者自己與「他者」之間建立一個發展的系譜。一方面，他認為這些「他者」是可以殖民者自己為參照點來加以理解的種族；另一方面，他則強調二者之間並不存在無法克服的發展落差。然而，這樣的論點仍只是呼應理番政策的目標，而且從「未發展—發展」角度看待自己與「他者」之間的差異，也符合殖民脈絡中的種族意識型態。換言之，他並未從相對性的立場理解原住民的特殊性，而是將其視為絕對的發展程度差異。這樣的局限性在他對於第二個問題的回應，亦即以心理學解釋理番遭遇的困難，並提供有效統治技術的建言中，看得更為清楚。

無疑地，當時理番遭遇的最大挫折，是 1930 年發生的霧社事件。原本被視為模範的平靜番社，竟然在理番官僚無預警的情況下，發生了殖民統治以來最大規模的「番害」。對於殖民政府而言，除了將事件歸咎於個別官員的心態與劣行外，「番人的心理」此時或許就像個無法看穿的黑洞，而需要心理學者的「知識之光」將其照亮，以消除內心的挫折與威脅感。對此，飯沼藉著將原住民心理還原成理智、感情本能與意志等基本向度，指出原住民心理的特徵，包括(1)無法正確認識客觀世界的事實、(2)輕易形成的關連法則思維、(3)低級的人生

²⁰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中)〉，頁 3。

²¹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二)〉，頁 3。

觀與價值觀、(4)頑固性強、(5)意志堅定、(6)粗笨的審美意識等。²²其中，雖然認知推理等智能力的低落或許是最為人熟知的評價，但是飯沼認為理番事業遭遇的真正阻抗，並不在於原住民的智能問題，而是在於他們情感的強烈與意志的固執性。

飯沼指出原住民精神生活的特徵，首要就是強烈的感情本能衝動。他認為與文明人「理性中心的生活」不同，原住民過的是「感情中心的生活」與「想像直觀萬能的生活」，²³兩種不同的心理結構，導致對於事物有不同的判斷與認知。因此，在同化的事業上，他建議不能一廂情願地把文明人認為正確的思考或是進步的生活形態，強加於原住民身上，否則只會增長其不平不滿的情緒。此外，他還指出原住民這種感情中心的心理結構，只知追求本能衝動的直接滿足，他們不像文明人一樣，能夠因應現實要求而以理智與意志壓抑本能的衝動，以期得到更大的或延遲的滿足。換言之，他認為原住民心理依循的是「快樂原則」，文明心理則是依循「現實原則」。²⁴即便是在維持生活所需的工作上，原住民原始的狩獵生活，也讓他們可以把工作與遊樂結合在一起，而在工作中同時獲得感情本能的滿足。但是隨著殖民統治而來的生活形態改變，包括槍砲的收繳、強制的勞動與限地

²²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六)〉，《理蕃の友》，昭和12年1月號(臺北，1937)，頁3-5。

²³ 飯沼龍遠，〈蕃人の精神生活の特徴(一)〉，頁4。

²⁴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五)〉，《理蕃の友》，昭和11年12月號(臺北，1936)，頁1-2。此處所提到的「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以及下文中所提到的冰山模式，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論。但是無論是在這兩篇演講的其它部分，或是在飯沼其它的心理學著作中，都未見到飯沼的學術研究曾受精神分析理論影響的其它跡象。或許如先前所提到的，飯沼發表這篇演講的場合是在理番幹部講習會，其最主要的關心並不在於學術興趣，而是擷取一些既成的心理學理論，應用於對理番工作的理解與建議。

耕作等政策，限制了這些衝動發洩的出口。因此，飯沼憂心當原住民被迫如文明人一般，只能把工作當成工作，而他們想要遊樂的慾望，又不像文明人可以藉著文學、藝術、宗教等活動獲得宣洩，這將使他們變得抑鬱且忿忿不平，而隨時有著爆發的危險。²⁵

至於在意志層面上，飯沼強調的是原住民幼稚但卻堅定的固執性，並以此解釋原住民對於祖訓與傳統社會規範的堅持，以及理番在改造原住民使其「日本化」或「現代化」時所遭遇的抵抗。飯沼曾舉兩個例子說明原住民意志的堅定。其一是他自己在番社進行調查時，當時正值布農族的收穫祭，依其風俗在這段期間內不能吃任何含糖的食物。當飯沼試著拿一些糕餅誘惑番童教育所的學童食用時，學童們都遵照風俗斷然地拒絕。這使飯沼感嘆即使是日本人的小孩，也無法有如此堅定的意志。另一個例子則是提到在泰雅族的風俗中，若是在交戰中吃了敵人提供的酒飯，就絕對不能再與其敵對作戰的慣習。霧社事件時，莫那·魯道的長子塔達歐·莫那在斷糧的情況下，接受了與殖民政府親善的原住民所帶來的酒與食物，而後即遵守此一慣習，不再抵抗而選擇自盡。飯沼認為這可看出即使是如此「兇暴的番人」，卻仍然有著極為堅定的意志。²⁶

對於原住民如此堅定而為理番事業帶來阻礙的意志力，飯沼認為只要用對了方法，其實並不難克服。他認為原住民的意志，並非如文明人一樣，是經過各種思慮，並以義務感、責任感及自尊心決定方向，再以意志貫徹的結果。相對地，原住民的固執只是由於理智思維的落後，無法提供更全面的思考與可能性，以致感情衝動只能依循既定的途徑，而缺少必要的彈性與變通。換言之，原住民的堅定意志，只是

²⁵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五)〉，頁2-3。

²⁶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六)〉，頁5。

一種幼稚的頑固性，而不是經過選擇後的自發行爲。一方面，飯沼認爲這爲殖民統治留下許多威脅利誘的操作空間，²⁷只要運用得當，就可驅使他們朝統治者所要求的方向改變；另一方面，他則憂心原住民雖然看來純樸天真，表現出某些高貴的情操，也沒有本島人狡詐自私等意志薄弱的缺陷，但是這並不代表他們的意志可以通過現代生活的考驗，而不會在各種刺激與誘惑下迷失。

飯沼曾以一個冰山的比喻，說明原住民心理與理番事業的互動（見圖 1）。²⁸



在這個圖示中，冰山代表人類心理共通的結構，露出水面的是分化發展成理智的部分，但佔有更大體積的卻是潛藏在水面下的感情本能。整座冰山運動的方向，是由水面上的風向及潛藏的水流所決定。飯沼認爲原住民與文明人的相異點，就在於理智與感情所佔有的比例。他憂心理番若只注意到表淺的層面，只把文明人的生活與價值觀強加在原住民身上，卻不了解在原住民心理中佔有絕大比例的感情本能，並

²⁷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六)〉，頁 5。

²⁸ 飯沼龍遠，〈蕃人の心理(五)〉，頁 3。

善加利用，那就會像是水面上的風，無論如何使勁地吹拂，都無法影響水面下原住民感情本能尋求滿足的衝動。

飯沼龍遠關於原住民心理的論述，可以被視為心理學者在霧社事件後，對於理番事業的診斷與建言。對於殖民者而言，當他們發現自己的監管與調查看不透水底下的冰山，也無法了解被他們稱為「蠻性」的黑暗世界時，心理學者藉著將原住民心靈理解為被強烈感情本能與幼稚意志宰制的世界，為他們的失敗找到了理由，並提供適當的統治技術。而在心理學「未發展—發展」的系譜中，相較於殖民者自己所代表的發展頂峰，原住民則無論理智、感情或意志，都被認為處於未發展而類似孩童的階段。藤澤祐的社會心理學實驗也是從同樣的預設出發，只是他更聚焦於當時殖民者或許最感棘手的情緒——憤怒。霧社原住民的憤怒爆發，造成了理番史上最大的傷亡與挫折。藤澤祐試圖再現這個現象，卻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結果！

三、原住民的「憤怒」

在檢視實驗的設計、執行與結果之前，對於藤澤祐實驗的假設，還可多作一些討論。如前所言，飯沼等日籍心理學者認為原住民心理處於一種未發展而類似孩童的狀態。以這樣的理論預設，他們一方面針對原住民的智能及其它感覺運動能力，進行了一系列的測定與比較，以證明其智能確實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並建構各族的發展位階。²⁹另一方面，則是有藤澤祐所進行的社會心理學實驗，以證明原住民「孩童似的感情中心」特質。

所謂「孩童似的感情中心」特質，乃是認為原住民與小孩一樣，

²⁹ 飯沼龍遠，〈形態盤成績の民族の相違〉，頁 415-420。

不但感情強烈豐富，而且缺少成熟理智與意志的制約力量，以致他們的行動往往被感情主宰。這樣的預設雖然以民族心理學及發展心理學理論為依據，但作為一門在殖民主義仍未破產的時代興起的學科，將民族心理學視為發展心理學一環的概念，本身即是種族意識型態的產物，二者往往相互呼應。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這樣的主張，其實也是多數殖民者對於原住民心性所抱持的看法。

例如，山路勝彥曾指出日本帝國所建構的臺灣原住民意象，主要是一種「兒童」或「嬰兒」的意象。³⁰他認為這個意象的形成，可能與日本將臺灣納入帝國版圖時，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於日本思想界的影響有關。³¹在這樣的意象裡，臺灣原住民一方面被視為「小」、「弱」、「愚」的孩童，因而需要保護與教育；另一方面，他們則被浪漫地描述為具有孩童「純真」、「素樸」、「無垢」、「可愛」等特質，而不像文明人一般機巧詭詐。³²這個意象既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政治上。例如在伊能嘉矩所建構的進化論人類學中，就曾有「〔臺灣番族〕身體雖有成長，但思想方面與嬰兒無異」³³的論述。而在理番政策上，雖曾經歷「嬰兒或禽獸」、「可教化或不可教化」的爭論，但是在同化政策下，臺灣原住民主要仍被視為這個家父長制帝國的嬰幼兒成員。至於所謂「感情中心」的特性，則是殖民者對於臺灣原住民心性的一貫看法。例如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一卷〈性情〉一節中，

30 山路勝彥，《臺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4），頁 83。

31 山路勝彥，《臺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96。

32 山路勝彥，《臺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蛮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頁 94-107。

33 伊能嘉矩，〈臺灣に於ける土着の分類及び其の現在通有する開花發生の度〉，《蕃情研究會誌》，1（臺北，1898），頁 12。

就提到原住民的性情「感情強烈，容易激動，感情變化快，缺乏忍耐自制的 ability，喜怒哀樂形於外。」³⁴

換言之，藤澤苜的實驗既是在驗證民族心理學的理论，同時也是在驗證殖民者對於臺灣原住民的普遍印象。然而，在喜、怒、哀、樂各種情緒中，他為何選擇「憤怒」作為研究對象呢？對此，藤澤苜並沒有在他的論文中作出說明。當然，這或許與當時心理學理論中，針對「憤怒」已有既成實驗可供複製有關。但是其它情緒並非完全沒有既成實驗可循，而且藤澤苜對於再現原住民的憤怒似乎有一定的執著。³⁵因此，對於他選擇實驗主題的動機，我們還可多作一些揣測，特別是其與當時殖民脈絡的關連，以更深入地了解這個實驗的意義。

憤怒作為一種負向的情緒，憤怒者與其所憤怒的對象或環境，處於一種緊張關係，一旦化為行動，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針對憤怒對象的攻擊破壞。此外，還有其他經過轉移的憤怒表現，包括對憤怒對象的冷漠逃避，以及在權力關係不平等的情況下，對於憤怒對象指令的消極反動等。另一種最極端的情況，則是將此憤怒指向自身，而有自傷自殺的行為。³⁶因此，從「殺人」到「自殺」，³⁷人際間的緊張關係，在情緒本質上都可能是憤怒的體現。同樣地，在殖民脈絡中，無論是

3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番族慣習研究——第一卷》(臺北，1921)，頁 76。

35 如下文所述，藤澤苜的假設並未在實驗中得到證明，因此他改由另一個角度詮釋實驗的觀察與結果。而此實驗的原始假設，則是在另一個也是為了證明這個假設而進行的調查報告中提及。參見藤澤苜，〈未開民族の叱責〉，《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哲學科》，8(臺北，1942)，頁 149-161。

36 山名正太郎，《自殺に關する研究》(東京：大同館書店，1933)，頁 103-106、109-116。

37 有關自殺的討論，參見巫毓荃，〈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臺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第 3、4 章。

民族之間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緊張矛盾，或是理番政策所遭遇的阻抗，也都可以從被統治者的憤怒來加以理解。

如飯沼的講演所言，殖民者在理番上所遇到的最大困難與挑戰，並不在於原住民智能的低下，而在於其情緒的疏通治理。殖民者認為原住民的行動受情感宰制，而其中特別值得憂心的情緒，無疑就是他們容易爆發的憤怒。不難想像，殖民政府當局與殖民者社群對於原住民憤怒的關注與戒懼，必然在霧社事件後達到一個高點。對於殖民者而言，霧社事件的爆發被簡化為兩個層面的因素。一方面，他們將事件歸咎於個別理番人員品德不佳、貪污腐化，且對番人抱持蔑視態度所引起的緊張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則認為這是「易於發怒的」原住民受到刺激後的「憤怒發作」。一百多名日本人的死亡，讓殖民者對於原住民的「憤怒」留下無可抹滅的慘痛印象。再者，就如飯沼在演講中所強調的，隨著理番事業的進展，原住民的生活形態逐漸改變，然而在生活改善的同時，他們的本能也受到更多的壓抑。這些本能未能獲得滿足的挫折，都可能成為憤怒情緒的來源，使他們即使不像霧社事件那樣直接發作，也可能對於理番統治抱持敵視、杯葛或被動不配合的態度。因此，在霧社事件後所頒佈的「理番政策大綱」中，殖民政府所強調的「原住民理解的重要性」、「理番者的信用」，以及「理番警察必須具有沈著厚重等精神特質的『人物中心主義』」等原則，都可說是為了避免激起他們眼中「易發怒的」原住民的憤怒，以達到控制其情緒、推動理番事業的目的。³⁸

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原住民的憤怒成為藤澤蒞的實驗對象。他提到自己進行實驗的目的，在於「與其以理番行政的日常番界

³⁸ 有關理番政策大綱與原住民心靈科學論述的關係，可以參見巫毓芬，〈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臺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第3章。

事物為基礎，採用自然方式的觀察法，不如用實驗的方法，一面促成其現象的發展，一面進行觀察，來得比較有利。」³⁹換言之，他意圖在實驗情境中再現並剖析「憤怒」的原住民。

四、「憤怒」的實驗

藤澤苜選擇用來研究原住民憤怒的實驗，是德國心理學家丹波(T. Dembo)所設計的「取花實驗」。這是她在柏林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的博士論文中，⁴⁰兩個用來研究憤怒情緒的實驗之一，⁴¹其指導教授則是社會心理學大師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

整個實驗的設計與流程如下：在實驗房間的地板上放置一個正方形的木框或竹框，其邊長為 250 公分。在距離木框一邊 120 公分的地方，放置一個高約 110 公分的檯子，檯子上與木框相對的一邊豎置一個花瓶，其上插了一朵花(目標花)。在木框的一角外，放置著實驗者的桌椅，使實驗者可以從被實驗者右方觀察、記錄其動作(在原住民實驗中，還有一位翻譯坐在一旁的椅子上)。框內的一角則放置一把椅子。此外，在與目標花相反方向的框外，也放置一個檯子，其上同樣放置一個插著花的花瓶，但是此花需從框內伸手可及，距離不可過遠。同時，實驗者桌上也有被實驗者伸手可及的花瓶與花。最後，在木框的兩側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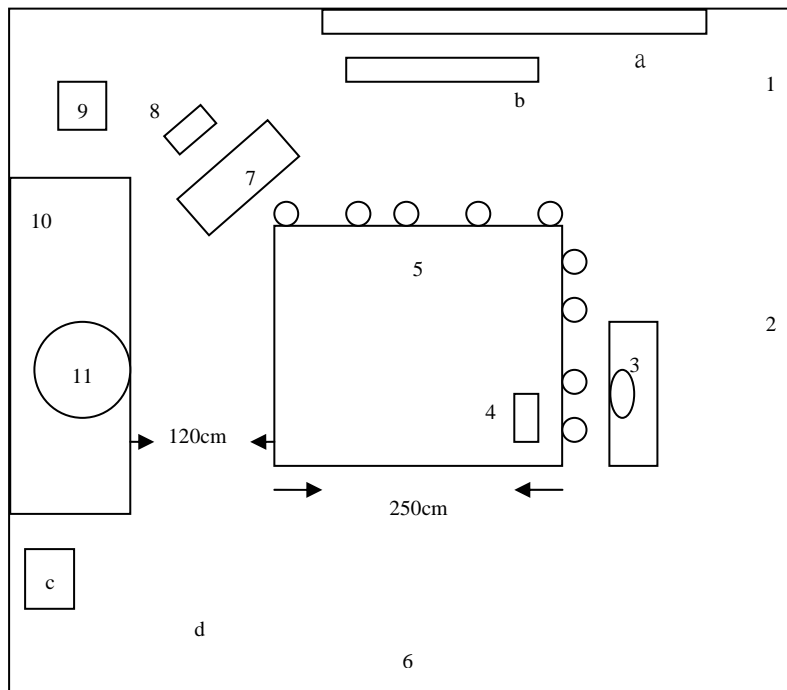
39 藤澤苜，〈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臺北帝國大學研究年報——哲學科》，6(臺北，1939)，頁 313。本文中文譯文，乃是參考中研院民族所余萬居先生未出版的譯文手稿加以潤飾而成，以下亦同。感謝余萬居先生以及陳傳興老師提供的資訊。

40 T. Dembo, "The Dynamics of Anger," translated by Hedda Korsch, in Joseph de Rivera ed., *Field Theory as Human-Science: Contributions of Lewin's Berlin Group* (New York: Gardner Press, 1976), pp. 324-422.

41 另一個實驗為套環實驗。

緣，還擺放著一些另一個實驗所使用的套環(見圖2)。⁴²

圖 2



a.黑板 b.課桌(測驗者作準備的工作臺) c.風琴 d.黑板(以上並非測驗所需之素材)

1.門 2.窗 3.花(替代目標) 4.椅子 5.竹框 6.鄰室 7.花(替代目標)

8.測驗者 9.翻譯 10.講臺 11.花(目標花)

實驗進行的方式，是由實驗者請被實驗者進入這個 250 平方公分的木框內，並對其發出第一個指令：「請你用手拿取那一朵花(目標花)，

⁴² 藤澤祐，〈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25。

但是不可把腳跨出框外。」當被實驗者嘗試完成這個任務時，實驗者則在一旁觀察並記錄被實驗者所有的行動與言語。要完成這個任務，可以有兩種解法，⁴³其一是把一隻手撐在木框與目標花之間的地板上，用以支撐身體，伏地以另一隻手取得目標花；其二則是把木框內的椅子搬到目標花的方向，無論在框外或框內，而後把手或膝蓋撐在椅子上，或是站在椅子上，便可伸手取得目標花。每當被實驗者以某種方式完成任務時，實驗者隨即發出第二個指令：「這是一種方法，但是應該還有別的方法，請你再用另一種方法去取花。」若是被實驗者完成第二種方法，則再請他找第三種方法、第四種方法等等。

實驗的時間沒有任何限制，也不針對此作任何說明，被實驗者並未被告知他們是否可以自行結束這個實驗。在實驗進行的過程中，除了上述兩個指令外，實驗者不再給被實驗者任何關於解法的暗示，但是會針對被實驗者某些行動或言語，不帶感情地重述上述指令或作出一些評論。例如，當被實驗者作出違反規定的嘗試時(如把腳跨出框外)，實驗者會重述第一個指令，或直接告知：「這是不行的！」「這樣不行吧！」若是被實驗者只是以某種解法的變形取得目標花時，則告知：「這跟剛才一樣吧！」「這不是一樣的嗎？」若是被實驗者向實驗者尋求關於解法的暗示，或是試探實驗者對其作法的反應時，則說：「你想怎著辦就怎麼辦！」「照你的想法做！」另外，當被實驗者指出再也沒有其它解法，或是乾脆想要放棄時，實驗者則回應：「還有其它方法！請你仔細想。」「不可能沒有了！」「再想一想！」等等。若是被實驗者放棄嘗試，而在框內動也不動，或把注意力轉移到

⁴³ 丹波在其文章中只提到了兩種可能的解法。但是在原住民的實驗中，藤澤祐描述了四種解法。其一是用竹子把花撥落後再取之(有一面的竹子是用兩根竹子相接而成)，另一個解法則是在框內全力跳起把花撥落，但不使兩腳踏出框外(這種解法有些危險，往往摔在地上，或是頭撞到檯子)。

其它事物時，實驗者則可提醒：「好，那另一種解法呢？再試一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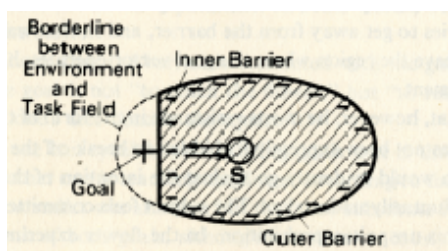
丹波設計這個實驗，是想使其成為憤怒的社會心理動力學模型。追隨其老師勒溫的心理學理論，丹波從拓樸學(topology)與動力學(dynamics)兩個層面剖析人類情感。勒溫的心理拓樸學，強調人類心理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周遭環境構成一個心理場(field)，其中有各個方向的心理力量(force)交互作用，其作用結果決定了人類的行動與心理樣態。這樣的心理場，勒溫稱之為生活空間(life space)，人類即是生活在一個個相鄰或重疊的生活空間中。至於勒溫的心理動力學，則是把人類心理視為一個張力系統(tension system)。每當心理有一種欲望(desire)產生時，就會造成系統張力的上升，促使其採取可以滿足此欲望的行動以降低張力；相對地，若是欲望受到挫折(frustration)，就會使心理系統因為張力過大而處於不穩定的狀態。⁴⁴

依據這樣的理論，丹波將整個實驗情境分析如下：對於被實驗者而言，目標花(goal)是其欲望達到的對象，因而會有一個指向目標的向量，促使其採行能拿到花的行動。然而，在無法找到新解法，但實驗者又聲明還有其它解法的情況下，被實驗者與目標之間，將會豎立起一道障壁(barrier)，而有一個與其欲望相反的向量抵銷其努力。於是，被實驗者的心理張力由於欲望無法滿足而開始變大。此時，若是在一般生活情境中，被實驗者可能選擇放棄目標，離開這個生活空間，以避免心理張力繼續累積。然而，在這個實驗中，由於被實驗者都是丹波在心理學研究所的同儕，在彼此互為被實驗者的科學社群中，雖然實驗者並未禁止被實驗者自行終止實驗，但是必須把這個實驗完成的

⁴⁴ 參見 Joseph de Rivera, "Introduction," in Joseph de Rivera ed., *Field Theory as Human-Science: Contributions of Lewin's Berlin Group* (New York: Gardner Press, 1976), pp. 1-36; 申荷永, 《充滿張力的生活空間——勒溫的動力心理學》(臺北: 貓頭鷹出版社, 2001), 頁 49-83。

義務(commitment)，使他們無法逕自離開。因此，他們所處の木框，就形成一道外在的障壁(outer barrier)，抵銷其想要離開的心理向量。於是，被實驗者就這樣身陷在整個實驗情境所構成的心理場中，既無法達成目的也無其它出路(見圖 3)。⁴⁵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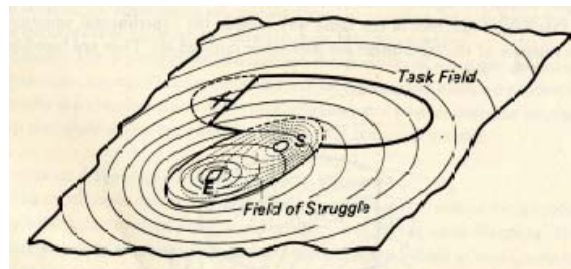


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實驗者的心理張力，由於持續的挫折而不斷累積上升。此時，有些被實驗者會採用一些方法來降低心理張力。例如，拿取隨手可得的替代目標；進入非現實領域，幻想可以用飛翔或是游泳的方式，越過內在障壁而到達目標；或是乾脆暫時放棄嘗試，而玩起木框旁的套環或沈思閱讀等。此外，被實驗者也會開始有一些經過修飾的憤怒表現，但尚未完全地爆發出來。例如，他可能開始否定另一種解法的可能性；抗議實驗者記錄的動作讓其分心；質疑實驗者是否在開玩笑；故意違反規定或以言語、行動試圖激怒實驗者等等。然而，實驗者不帶感情的回應方式，使這些方式不但無法抒解情緒，甚至還加重其挫折感，而開始將憤怒情緒指向實驗者。依據丹波的分析，由於實驗者與被實驗者原為研究所同儕，在未進入實驗情境

⁴⁵ T. Dembo, "The Dynamics of Anger," p. 340.

之前，彼此地位平等。但是一旦進入實驗之後，由於對實驗完全不了解，在假設實驗者知道更多解法的情況下，彼此的平等關係開始傾斜。因此，被實驗者在實驗中，事實上處於一個較為低下的地位，因而他們會想要藉由發現新解法，來向實驗者證明自己的能力。一旦遭遇挫折，再加上實驗者冷漠的回應，就會對其自尊構成極大的威脅。因此，隨著實驗的進行，被實驗者身陷的心理場，逐漸轉移到其與實驗者之間的權力鬥爭(見圖 4)。⁴⁶

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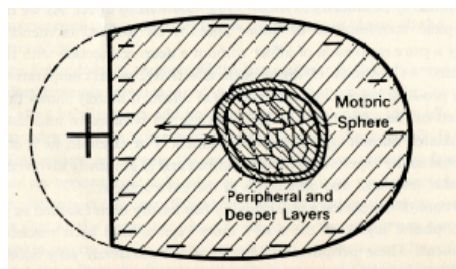


同時，隨著心理張力增大，被實驗者的心理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原本在表層分化出來控制行為的部分，由於深層情緒不斷地往外擴張，使得分化的界限逐漸模糊，不再保有其原有抑制心理深層情緒的力量。於是，情緒對於被實驗者言語與行為的影響越來越大(見圖 5)。⁴⁷

⁴⁶ T. Dembo, "The Dynamics of Anger," p.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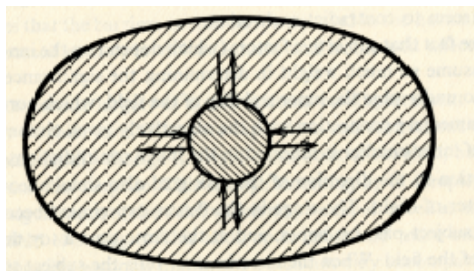
⁴⁷ T. Dembo, "The Dynamics of Anger," p. 406.

圖 5



最後，極端強烈的情緒終於摧毀了被實驗者心理分化的界限，而將整個被實驗者的心理統合在情緒的控制之下。這是一種心理未分化前的原初狀態，一種類似孩童心理的狀態，情緒決定了所有的行動(見圖 6)。⁴⁸此時，被實驗者會表現出強烈的憤怒爆發，他可能對著實驗者大聲咆哮；可能氣沖沖地離開實驗場所，拒絕再接受任何實驗；他也可能破壞某個實驗器材，以發洩心中的憤怒。

圖 6



⁴⁸ T. Dembo, "The Dynamics of Anger," p. 410.

簡言之，丹波藉由這個實驗所建構的憤怒心理模式，認為憤怒是個體在其所在的生活空間中，遭遇欲望無法滿足的挫折，或是自我尊嚴受到他人的威脅，但又無法逃離此一生活空間，而使其心理場域中的張力不斷增強，最終鬆動並破壞其心理結構中已分化的界限，回復到原初由情緒統整一切的狀態，並表現於言語與行動。換言之，憤怒爆發是一種類似孩童由情緒宰制一切的心理狀態，而心理分化未完成的孩童也因此容易出現憤怒的發作。⁴⁹

五、消失的「憤怒」

同一實驗若以原住民為被實驗者，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從當時殖民者所認定的原住民心性來看，無論是舊慣調查者眼中「缺乏忍耐自治能力，喜怒哀樂形於外」的原住民，或是心理學家所論述的「孩童似的」、「感情中心的」心理特質，他們所描述的原住民心理結構，其實就類似文明人在張力下崩解而退回的孩童心理狀態(上節圖 6)。因此，若是讓原住民處於相同的挫折情境中，理應更容易被激起憤怒的爆發，而且由於缺少修飾隱藏情緒的能力，他們應有更直接激烈的憤怒表現。這正是藤澤苜最初進行這個實驗的假設，也是他所想證明的原住民心理事實。⁵⁰

若是我們分析整個實驗情境，將會發現它與當時原住民的真實生活空間，其實有一些類似之處。首先，相對於丹波實驗中，由「科學社群義務」所樹立的那道無形外部障壁，在原住民的真實生活中，無論是被隘勇線包圍的番社，或是被移住到平地而受駐在所嚴密監視的部落，都有一條由行政力所設置的障壁，嚴格管制原住民生活的範圍

⁴⁹ T. Dembo, "The Dynamics of Anger," pp. 413-416.

⁵⁰ 藤澤苜，〈未開民族の叱責〉，頁 161。

與行動。其次，殖民教化事業所欲原住民發生的改變，包括風俗、法律、語言、生產方式與國家認同的日本人化等，恰似被實驗者在實驗中被要求完成的目標，而民族文化間的巨大差異，則使得這目標也像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丹波實驗中最突出的面向，在於她把實驗者與被實驗者的關係納入觀察分析的範圍。⁵¹被實驗者認為實驗者知道更多解法，這威脅到他們的自尊，並激起他們的對抗意識，而實驗者冷峻的回應與批評方式，又強化了這樣的傾向。這使得被實驗者將其憤怒指向實驗者，而把整個實驗視為他們與實驗者之間的鬥爭。同樣地，在真實的理番情境中，幾年前的霧社事件也是原住民對於日本統治者的憤怒與鬥爭。換言之，藤澤苜在這個實驗中，正是以其作為實驗者又作為日本統治者的身分，試圖在這個狹小的實驗空間裡，再現原住民／被實驗者對於日本人／實驗者的強烈憤怒。他想藉由這樣的模式理解原住民對於日本統治者的憤怒，並且透過展現「容易憤怒的」原住民，證明這樣的憤怒乃是源自原住民心理結構的幼稚、病態與不理性。

然而，二者仍有無法類比的地方。我們必須注意，丹波與其被實驗者在實驗外是平等的同儕，而藤澤苜與原住民被實驗者在實驗外，卻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事實上，這個差異或許就是兩個實驗結果迥異的關鍵因素。⁵²現實情境中可以發現的憤怒，

⁵¹ Danziger 認為勒溫在柏林大學的團隊，是實驗心理學中「失落的大陸」(lost continent)。其所稱道的就是他們把實驗情境視為一種社會情境，實驗者與被實驗者的關係也如實地被視為一種社會關係，並成為人格研究中一個必要且最核心的研究對象。換言之，這也是一種「心理學實驗的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of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Kurt Danziger,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Historical Origin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3-178.

⁵² 見下節。

卻在實驗情境中消失了。從泰雅族、賽夏族、排灣族到魯凱族，⁵³藤澤蒞花了數年的時間，親履番地進行了數百次的實驗，卻從未發現任何一個因為挫折失去情緒自制能力，而在實驗中「憤怒發作」的原住民。他所看到的，只有固執地反覆嘗試同樣方法取花，既無法成功又不願放棄的泰雅族人；消極逃避的賽夏族人；一副猜疑的樣子，站在框內動也不動的排灣族人；以及嘗試著各種方法，整個實驗進行過程中都奮力不懈的魯凱族人。⁵⁴從實驗的結果來看，臺灣原住民這些未開化的民族，不但不像藤澤蒞所假設的那麼容易發怒，甚至比起丹波原始實驗中的受試者——這些站在所謂文明發展頂峰的心理學者——有著更好的情緒自制能力。

然而，藤澤蒞並未就此放棄自己對於原住民心理的預設。他進一步提出另一個問題：「在實驗中找不到的憤怒，難道在日常生活中也找不到嗎？」⁵⁵並隨即設計了一個針對原住民學童的問卷調查，希望從原住民父母斥責或體罰小孩的頻率與方式，找到原住民容易憤怒的證據。然而結果依然令他失望，原住民父母非但不比公學校或小學校學童的父母嚴厲，甚至還要溫和許多。對此，藤澤蒞只好將其解釋為原始民族的「溺愛」。⁵⁶

至於在取花實驗中所展現出來的心理現象，他則是轉而以「境界現象」(boundary phenomenon)的概念來加以解讀。所謂「境界現象」是勒溫社會心理學理論中，用以描述從一個生活空間轉換到另一個生活空間時，在兩個生活空間交界所經歷的心理經驗。生活空間轉換的門

⁵³ 雖然藤澤蒞提到他曾對六族進行過實驗，但在可查的文獻中，只有四族的報告。

⁵⁴ 藤澤蒞，〈未開民族の叱責〉，頁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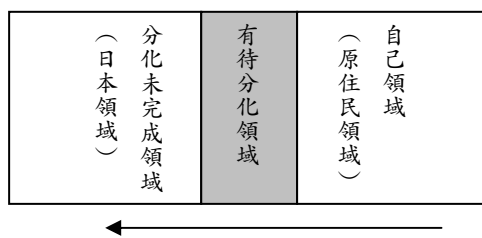
⁵⁵ 藤澤蒞，〈未開民族の叱責〉，頁 161。

⁵⁶ 藤澤蒞，〈未開民族の叱責〉，頁 161。

檻，就像這個實驗要取得目標花所必須克服的內部障壁。至於在殖民脈絡的實驗中，實驗者的日本人身分，則使這個內部障壁，代表著臺灣原住民在「進化」進入日本領域時，所遭遇的困難與挫折。於是，藤澤提到「若是忽視他們(指原住民)所謂的『日本』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此影響的接受，則將無高砂族進化之考察可言」，因此，「我們必須明瞭他們接受〔日本〕的行動事理」，以及「種族群別」的差異。藉著拓樸心理學與力學上的概念，

我們可視「日本」與「高砂族」是兩個相接壤的領域。然而，其接受當然並非同時遍及「日本」整個領域，而是逐步通曉當下問題的部分領域的結構；換言之，乃係領域分化之累加。同時，這也是將其與自己的領域合而為一，使之成為擁有一個結構的領域，也就是自己領域的擴張。有待分化的領域，夾在自己領域與分化未完成領域之間，儼然成為一境界。因此，接受之生於境界領域乃自明之理；再以其接受之行動而言，並以其現象層次而言，或以研究材料而言，皆可稱之為一種境界現象。⁵⁷

圖 7



⁵⁷ 藤澤祐，〈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11-312。示意圖為筆者所畫。

換言之，藤澤菴認為自己所觀察到的，是原住民在進入「日本領域」的過程中，在「自己領域」與「日本領域」交界處所發生的心理境界現象。

在這條境界上，各種現象五花八門，也可以從許多不同角度來分析詮釋。藤澤雖然知道自己作為這個實驗的實驗者，不但是實驗的觀察者，同時也是實驗的參與者，對於原住民被實驗者而言，他的在場與指令，正重現了日本殖民者在原住民「進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他身為殖民者的角度，一方面使他忽略了這個實驗中最直接的社會關係，而把被實驗者在實驗中的表現，詮釋為原住民對於「進化」、「文明」與「日本人化」（這三者被等同為原住民「分化未完成」的領域）的反應，而未觸及原住民對於「日本人」的感受與態度；⁵⁸另一方面，他也無法如丹波所做的一般，藉著注視、聆聽及詮釋被實驗者的言語與行動，來理解更多在社會關係中被掩蓋或扭曲的心理訊息，而只是記錄、計算與分類被實驗者表面可見的行動，再依人類學家與行政系統所劃分出來的種族部群，嘗試得出各個種族在「進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種族文化人格特徵。

於是，藤澤菴把實驗中的行動觀察，量化成「努力度」與「分化度」兩個指標。所謂「努力度」，是指被實驗者在特定時間內採取行動嘗試達成任務的次數。所謂「分化度」，則是指在此時間內順利找出解法的次數。其中，泰雅族是屬於「努力度」高，但「分化度」低的族群，亦即他們在實驗中努力不懈地嘗試取花，卻無法找到真正的解法；魯凱族中的某些部落則是「努力度」與「分化度」皆高；至於賽夏

⁵⁸ 換言之，日本的殖民統治被抽象化為「進化」、「文明」與「日本人化」等抽象概念，而不是殖民關係中真實的、每日面對面的日本統治者。見下節。

族與排灣族，則是呈現「努力度」與「分化度」皆低的消極態度。⁵⁹

對此，藤澤提到「努力度」低的被實驗者，他們對於進化的否定與拒絕，通常其說法是目標花「離得太遠了」，然而他認為這：

並不是受驗者的肢體比人短，而是他們的「觸角」太短，亦即缺乏決定熱情之方向的力量，也欠缺行動上的積極態度。因此，他們總是在極早的時期裡，即認為人和目的物之間的距離，是一種無法達到的距離，於是在兩者之間築起一道致命性的隔牆。同時他們也總是認為此牆業已堵塞人和目的物之間唯一或所有的通道，使其障壁式的消極氣氛瀰漫於整個場面的空間之中……。

姑且不論其個人，但是，人們總是自行杜撰一堆無法達成目的的藉口，使其自我與分析場面的能力都完全埋沒在其藉口的氾濫中。為了使受測者嘗試達成其目的，測驗者曾一再給予善導，但是，屢次誘導的累積也終未能使受測者認清場面的結構……然而，人的行動的積極態度乃在其影響之下，趨於極度的頹廢與歪曲，終使待解決問題與其試探及磨練失去了相關關係。⁶⁰

對於各個種族在文化人格上的差異，藤澤荷則是從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與社會階層結構來加以解釋。他指出賽夏族由於在與泰雅族的歷史爭鬥中落居下風，因而使其種族人格呈現較為畏縮怯懦的特質。賽

⁵⁹ 有關泰雅族與賽夏族的實驗結果，參見藤澤荷，〈アタヤル族とサイシャット族とに於ける指導社會との間の社會的境界現象〉，《心理學研究》，13(東京：日本心理學會，1938)，頁 55-72。有關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結果，參見藤澤荷，〈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25-347；藤澤荷，〈臺灣高砂族の心理學的研究〉，《民族學研究》，18：1/2(東京，1954)，頁 25-27。

⁶⁰ 藤澤荷，〈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84-385。

夏族傳統要求男子的「快腿」能力，反映在實驗中，就是被實驗者不作任何嘗試就自認想不出任何方法，而急欲離開實驗情境的行動特性。⁶¹至於排灣族，則是由於社會階層分明，對於有權勢者的尊敬與畏懼，使他們在面對障壁時，思考過多(think-too-much-of-the-barrier)，而無法採取任何行動。⁶²相對地，雖然泰雅族崇尚武勇、重視名譽的特質，使他們勇於嘗試而不輕言放棄，但是智能發展較落後的限制，使他們找不出解決的方法。此外，藤澤還援引了各族理番警察的經驗，以證明這些在實驗中所發現的種族文化人格特徵，正反映了同化政策執行過程中所遭遇的真實困境。⁶³

一個意圖發現憤怒的實驗，最後再現的對象，變成是各族原住民朝向「進化」或「日本化」的努力態度與成果。藤澤荷所欲了解的，依然是理番教化的困難，只是對象從「憤怒」的原住民，轉而成爲「消極懶散」、「缺乏熱情」的原住民。從這個實驗結果來看，我們可以肯定地作出藤澤荷未曾言明的結論：既然原住民在這樣的處境下都未曾發怒，那應當就不存在所謂「衝動」、「易發怒」、「孩童似」、「感情中心」、「缺乏忍耐自制能力」的原住民。這些原住民意象都只不過是殖民者的種族偏見。但是，即使不存在所謂「容易憤怒的」原住民，在實驗情境或是殖民歷史中，原住民的「憤怒」真的不存在嗎？

61 藤澤荷，〈アタル族とサイシャット族とに於ける指導社會との間の社會的境界現象〉，頁 55-57。

62 藤澤荷，〈臺灣高砂族の心理學的研究〉，頁 21。

63 藤澤荷，〈高砂族を被験者とする心理學實驗情況、タイヤルとサイシャット族〉，《科學の臺灣》，3(臺北，1935)，頁 10。

六、「憤怒」的回復

事實上，在藤澤蒞的分析中，有一個失落的環節。正因失落了這個環節，使得藤澤即使可以超越實驗情境將殖民政治社會背景納入分析，而把取花任務詮釋為殖民教化期待原住民發生的改變，並從原住民的實驗表現，看出他們對於理番政策的態度與反應，但是他卻無法看出臺灣原住民在其消極或積極態度背後所潛藏的情感。這個失落的環節就是歷史中與實驗情境當下的殖民關係。作為一個殖民者，對於藤澤蒞而言，相對於原住民「自己」的原始領域，「日本」領域是一個原住民理應無條件追求心理分化、進化的方向。無論是命定的進化或是文明教化的恩惠，日本帝國及其所帶來的影響，都只被視為一個抽象的領域：一個進步與文明的象徵。因此，他只能從原住民的行動中，看到他們追求這個抽象目標的能力與努力程度。

但是殖民關係的形成，卻是帝國軍事、政治力量造成的結果。在真實的殖民歷史中，對於臺灣原住民而言，日本帝國與日本人，曾經是以軍事力量入侵其生活空間的交戰對象，他們曾以武力脅迫原住民改變原有的風俗、信仰與生活方式，迫使他們離開熟悉的祖居地，而且此時正佔據優勢的統治地位，嚴密地監控、指導所有原住民的言論與行動。因此，「日本」並不是如藤澤蒞所想的那樣，只是一個抽象領域，而是具體化身於每日影響原住民生活的理番官僚與理番政策中；它或許象徵著文明，但它同時也是原住民可以明確認定的「異族」與「統治者」。換言之，藤澤蒞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真實遭遇的歷史，而且在當下的實驗情境中，他也未看出自己與被實驗者間的殖民關係所蘊含的緊張。實驗中的這條境界，不但是「文明」與「原始」的交界，同時也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自

我」與「異族」的交界。或許，自我與民族的尊嚴、鬥爭、挫敗、憤怒等丹波所分析的情緒，在這條境界上並不是未曾發生，只是在不平等的殖民權力關係中，它們披上了巧妙的偽裝。

不僅在殖民科學領域，就算在一般科學研究對於個人行為的觀察與分析中，也時常有這樣一個失落的環節。以客觀凝視者自我標榜，科學觀察者經常假設被觀察者也會如是看待自己，而忽略了自己與被觀察者的社會關係，對於實驗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但就如 Danziger 所言，勒溫學派最突出的貢獻，就在於他們考慮到實驗者與被實驗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將其納入分析的範圍。而以丹波實驗為範例的藤澤蒞，難道不會發現自己與被實驗者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嗎？這只是單純的忽略？或有其他更深沈的理由？同樣的情況還可在 Jock MuCulloch 所描述的非洲心靈精神分析中看到。⁶⁴鼓勵被分析者說出所有意念，並且強調反思分析關係的精神分析，其實更有可能發現殖民關係造成的影響。但最終所有被殖民者的敵意，卻還是被歸因於非洲民族的家庭與文化因素。或許對於殖民者而言，自己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是不可想像的，一方面這會威脅到他們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可逾越的民族界限；另一方面，這也會迫使他們正視在文明使命的美麗口號下，真實、悲慘的殖民歷史。

所幸藤澤蒞忠於丹波實驗設計的記錄與報告方式，⁶⁵為當時被實

⁶⁴ Jock MuCulloch, *Colonial Psychiatry and 'the African Min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91-104.

⁶⁵ 丹波的實驗設計，要求實驗者詳細地記錄下受試者在實驗中所有的反應，包括言語、行動、表情、姿勢等，而且在實驗後也會要求被實驗者追述自己在實驗中的感受，以印證實驗者對其情感的分析。在丹波所發表的博士論文中，並未完全列出這些實驗記錄，而只分析片段作為理論的佐證。而在藤澤蒞所發表的多篇論文中，大多也採用同樣的形式，只有在一篇發表於帝大研究年報的論文中(〈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

驗者的言語與行動留下了部分原始資料。而且他在實驗結束回到臺北後，還曾發函請各番社理番警察以詢問或私下探訪的方式，蒐集原住民對於實驗的觀感。藉助這些資料，我們可以從不同於原作者的角度，揣摩當時被實驗者的情緒與感受。

例如，泰雅族被實驗者 37 歲的「マライノミン」，在連續一個半小時都重複著伸長手臂、而後跌臥地上的失敗嘗試後，「顯出不安焦慮、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但仍反覆著同樣的作法」。實驗者「加以責備」(意指責備其不聽制止，重複無用的動作)(以下引文底線字皆為筆者所加)，

被實驗者說：「平時會犯的胸痛，這時又開始發作起來，所以其他解法想不出來。」一邊忍耐著痛苦，一邊帶著困惑說出這些話。實驗者這時轉而注意翻譯的動作，被實驗者對於自己發言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一度帶著似乎有些怨恨的目光望著翻譯，又轉而注視目標花，又看看翻譯，眼神裡好像閃爍著什麼似地。

然後，又轉向花，不發一語地帶著憤怒的表情佇立不動……。

實驗者問：「你在想些什麼？」被實驗者立刻轉變成帶著笑容的和善表情，說：「什麼都沒在想，也什麼都沒說……，說是應該有想些什麼，但是連什麼都沒有」。實驗者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會什麼都沒想。」

被實驗者雖然眼神很冷酷，但帶著笑容說：「我在想百姓的事，還有子女教育的事，在想水田耕作，還有送子女上學的事情。」實驗者說：「應該不會只想這些。」被實驗者堅決地看著實驗者(內心被打動的樣子)。被實驗者用鼻音說：「現在教育所

カイ〉)，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幾個個案的實驗記錄，並把實驗後對於被實驗者的調查結果，以附註的方式發表。

兒童穿的衣服很不體面，我們作父母親的，沒辦法讓子女穿還可以看的衣物上學，子女也是因為這樣才覺得丟臉而不能用功唸書吧！……房子也想建改良家屋。我們泰雅族現在的房子，因為幾乎都只用竹子建造，所以不能保持長久。……我想一定也得想辦法改善生活吧。……連耕作不好，必須改用定地耕(水田)……。我想人必須要端正自己的心，不能說謊。我心裡想到的，就是只有這些，其它沒有了。」(實驗歷時兩小時四十五分鐘)⁶⁶

對於這樣的實驗結果，藤澤苜曾作出一些詮釋。首先，對於泰雅族人不屈不撓地反覆嘗試以同一方法取花，他覺得「每三十秒就撲倒而把手落到榻榻米上，發出單調的聲音，以及運動的反覆，讓人驚嚇。」⁶⁷其次，對於明明是在進行實驗的場合，被實驗者卻提到教育、授產、生活改善等問題，他認為這顯示出被實驗者無法了解實驗者的科學研究者身分。對於他們而言，從臺北來的心理學者與駐在所的警察一樣，都是支配他們的統治者，因此才會在實驗中談到這些與行政官僚體系相關的問題。一方面，這意味他們在實驗中的表現，應當就類似他們平日對於殖民政策與理番官僚的態度；另一方面，藤澤提醒任何實驗者都必須考慮這種帶有強制性的關係，對於實驗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⁶⁸最後，藤澤苜認為從日本與泰雅族之間的統治關係來看，作為被統治者的泰雅族人，承襲其崇尚武勇且重視榮譽的傳統，具有自

66 藤澤苜，〈アタル族とサイシヤツト族とに於ける指導社會との間の社會的境界現象〉，頁 61-65。

67 藤澤苜，〈高砂族を被験者とする心理學實驗情況、タイヤルとサイシヤツト族〉，頁 10。

68 藤澤苜，〈高砂族を被験者とする心理學實驗情況、タイヤルとサイシヤツト族〉，頁 11。

尊心強、不輕易屈服放棄等特質。⁶⁹

的確，藤澤苜的詮釋正確地引入實驗者與被實驗者間的社會關係，而能從被統治者對於「日本」的態度解讀實驗的結果。此外，其開放性地詢問被實驗者心中意念的作法，也已是殖民關係中難得的場景。然而，他畢竟無法正視實驗結果所呈現的情緒，包括自己與被實驗者的情緒。泰雅族被實驗者口中發出聲音，伸長手臂，失去重心撲倒在榻榻米上，隨即爬起來再重複同樣的嘗試。如此不知疼痛、不知疲倦、不聽制止的動作，持續了兩、三個小時。這些看似不理性的行動，他們對於實驗者交付任務近乎愚勇的執著，難道不是自尊心受到傷害後，一種經過轉移的憤怒表現嗎？否則實驗者又怎會覺得「驚嚇」！被實驗者在實驗者要求其說出心中意念時，所談到的教育、授產與風俗改善等問題，除了是回答殖民統治者的標準答案之外，他對自己族人生活水平低落所感到的羞恥與不足，以及對於受教育子女與未來生活的期待，反映的不也就是他在這個實驗中的痛苦處境以及超越的渴望？被實驗者眼神中偶爾流露出的憤慨情緒（不發一語地帶著憤怒的表情佇立不動），面對實驗者時可以迅速轉換的虛假表情（立刻轉變成帶著笑容的和善表情），這些難道不就是藤澤苜進行實驗時，所渴望能透視原住民情緒心理的絕佳素材？只是他並沒有詢問，或許他知道在殖民關係中，殖民者很難從被殖民者口中得知他們的真正感受；也或許原住民隱忍情緒的能力，以及他們真正憤怒的對象，不但是其科學假設的反證，同時也是殖民者自己心理不願面對的焦慮。

藤澤苜的實驗目標，從原住民的憤怒情緒，轉變為他們接受日本文明的態度。但是他若能把「日本文明」分為「日本」與「文明」兩

⁶⁹ 藤澤苜，〈アタル族とサイシヤット族とに於ける指導社會との間の社會的境界現象〉，頁 56、61。

個部分，或許就可以同時觀察到這兩個對象，亦即針對「日本人」的憤怒，以及渴望「文明」的行動。被實驗者(被殖民者)面對實驗情境(殖民統治)的無奈，自尊心受挫的憤慨，讓他們更是拚了命地想要達成文明的目標，並把希望寄託於未來。無疑地，這是一種在殖民緊張中形成的民族情感。以下兩個泰雅族被實驗者也有類似的表現：

「ソヤタイモ」，37 歲男性。在連續兩個半小時重複同樣的動作後，被實驗者說：「只把手伸出去，任何人都拿不到吧！」實驗者於是問他，為何明知拿不到，卻一直重複同樣的動作。被實驗者答道：「我想若是拼命地伸手練習，或許可以拿得到吧！」隨即又開始不斷重複相同的嘗試。實驗結束後的談話中，被實驗者說：

我已經連續三天來這裡，直到今天才輪到我。只要是對我們無知的泰雅族人有益的道理，每天來也不會覺得浪費時間。只可惜盡了力還是無法完成，真是覺得遺憾……。日本教導我們的事都合乎道理，可是可以用簡單的方法來教我們。若是我們的頭腦不要那麼頑固的話，就可以早一點進化，真是太可惜了……。

翻譯這時提醒，

不管怎著說，這是先生要我們做的事，所有人都應該要做。⁷⁰另一位受試者「タイモパイホ」(33 歲男性)，則是在反覆嘗試一個半小時後，

臉上有著明顯不知所措與痛苦的表情。「因為距離太遠了，可以輕易取得的方法，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現在進教育所的孩子們，將來應該可以做得吧！」暫時不知如何是好而停止，

⁷⁰ 藤澤祐，〈アタル族とサイシヤット族とに於ける指導社會との間の社會的境界現象〉，頁 65-68。

隨即又忍著痛苦繼續嘗試。⁷¹

相較於南番的綏撫政策，泰雅族等北番是殖民政府軍事征討的主要對象。⁷²這些三、四十歲的泰雅族被實驗者，在威壓時期以及其後零星發生的「番害」、「膺懲」事件中，或許都曾目睹同族父執輩甚至親身經歷與日本人的戰鬥。如今，作為戰敗者與被統治者，在被命令進入實驗的框架，陷入實驗者設計出來的相仿困境時，心中或許滿是無法表達的憤慨、遺憾與羞恥，卻也有著不肯認輸的執著。藤澤祐將其歸因於泰雅族崇尚武勇的民族文化性格，從歷史文化角度解釋其「蠻勁」。然而，他卻忽視自身曾與其作戰的歷史，忽視自己作為征服者的身分。換言之，他終究無法以歷史分析取代人類學或民族心理學分析，以詮釋其所觀察到的現象。

類似泰雅族的「努力度」，還出現在魯凱族的「トナ」與「マガ」兩個番社。藤澤祐以為此二社與魯凱族其它部落相距較遠，文化上受布農族影響較大，因而具有與其他魯凱族不同的文化性格。但是，在藤澤祐對於受驗番社歷史背景的說明中，他提到「トナ」與「マガ」是南番中少數曾受到軍事征討的番社。而依《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的記載，「マガ」社曾於

明治 36 年 12 月，遭受到警察隊的征討。這是因為本社的社民，殺害派駐本社的警員所引起。從前，本社是個擁有 200 家戶的大部落，可是自此人口衰減，成為如今的 50 戶。(番社中人述說當時的情況，並且辯曰：「……我們防戰，惜不得勝。當我們逃入前方山上的時候，日本砲轟我們的番社，然後進攻墩仔

71 藤澤祐，〈アタル族とサイシャツト族とに於ける指導社會との間の社會的境界現象〉，頁 68-69。

72 在早期的理番政策中，有泰雅、賽夏等北番與魯凱、排灣等南番的區分，大致遵循的是「北剿南撫」的原則。

社(即「トナ」)。我們把巨石放在墩仔社的斷崖上，準備在日本兵路過崖下的時候，將其推下。可是日本人都中途折返，未曾來到。後來聽說，那是因為他們的大砲毀損，而且有人受了傷的緣故。」)⁷³

對此這段日本討伐草草告終的歷史，藤澤另外提到在這兩個番社中，「據說直至不久以前，仍有多人懷述往事引以為榮。」⁷⁴

因此，這也是曾與日本有過戰鬥經驗的番社，而他們在實驗中也表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難道這些殖民統治的歷史，不會沈澱在民族記憶中，進而成為他們所謂的「文化民族性格」的一部份嗎？

同樣隱忍的憤怒，以及不服輸的精神，亦可以在一個魯凱族被實驗者的記錄中看到。

「ギギウ」，「マガ」社 33 歲男性。他在歷時 161 分鐘的實驗過程中，以 15 分鐘為一個時段，「努力度」(嘗試的次數)分別是 86、105、108、120、97、77、69、68、50、31、14，可以說是拼了命地想要完成這個任務。幾百次的嘗試中，他也找到了三個解法。但是在實驗者仍堅持有其他解法的情況下，他的情緒最後似乎有些混亂，並且力圖保住自己的尊嚴。以下是其在實驗中發言與行動的觀察摘錄。

愧為男子漢，怎麼拿不到呢？

構不到，那麼近，怎麼會構不到呢？愧為男子漢！

我的腳跨出去了嗎？這件衣服，礙手礙腳的！(實驗者觀察記錄：因為當局鼓勵穿和服，所以在番服上面，又穿著一件日式睡袍。)

怎麼不過來一點嘛！？如果能再把手伸長一點就好了！手短沒辦法！是不是怎麼地也拿不到呢？真是愧作一個大男

⁷³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臺北：南天書局，1983)，頁 48。

⁷⁴ 藤澤祐，〈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429。

人！(實驗者觀察記錄：忙忙碌碌，發言與嘗試不間斷，聲音低沈。)

(類似狀況持續一個多小時後)

作這種事，跟過河沒什麼不同……洪水氾濫的時候，很想渡過河去，雖然很想走進水裡，可是一走進去，就會被急流沖走。有什麼辦法呢？

只要用這個辦法，就是斷崖上面的東西也可以拿得到！……拼了命把身體伸過去，就會立刻倒地死掉！

倒下去就會受傷，甚至一命嗚呼！

所以嘛，河上跟深谷都要架橋，以免令人傷腦筋。

(實驗者觀察記錄：許久未曾直視實驗者了！)

為什麼拿不到呢？一個大男人……為什麼拿不到呢？……還是不能！

(實驗者觀察記錄：故意地，大模大樣地[走出框外]摸了摸目標花後，退回框內去。)

作個圈環去拿最好！從天花板垂下一副鞦韆來，盪過去拿了之後。再盪回來就好了！……只不過想想罷了。

捕魚的時候，這樣用鐵絲刺下去，就能馬上捉得到。

別人把東西藏起來的時候，都會想一想他到底是放在什麼地方，到處去找！

跟別人打架的時候，想一想別人為什麼要打架。自己認為不打比較好，可是對方耍起脾氣來，說是要打架了，來吧！從遠地方去拿吧！如果說非幹不可，我雖然是不喜歡打架的，你要硬追過來才打，如果是無論如何也去不得，就是要死，我也要去去看！準備從下面上去打架，還是架起橋來，攀上斷崖，抓住葛藤，爬上去打架……。

已經渡過來了，想打架的話，現在可以打了！

假定某種小鳥在樹上築了巢，應該怎麼做才能拿得到它呢？
扔了石頭，就會打死牠，怎麼去拿才好呢？讓我來想想看吧！
再也沒有別的主意了！

(實驗者觀察記錄：把臉部轉向左邊去)

山豬、山羊和鹿渡河逃到對岸去了，狗兒去追，然而終於捉到了；於是想一想，為什麼能夠捉到。本來是想，不捉也罷，回去算了，可是難得狗兒去捉來了，所以應該隨便砍一根木棍，用葛藤作個圓圈……。

(實驗結束)⁷⁵

依照丹波的分析，當被實驗者內在張力與憤怒情緒逐漸累積時，爲了尋找出口，他可能會以非現實方式幻想自己與目標之間的空間，而在非現實領域中達成目標，以得到暫時的情緒宣洩。例如，被實驗者可能幻想自己與目標之間是一條河，而可以用游泳的方式渡河取花。事實上，這樣的非現實幻想也是對於整個實驗與實驗者的情緒攻擊，以反映此時被實驗者對於自己所陷入之荒謬處境的反彈，並抒解心中的憤怒。同樣地，公然違反實驗規定也有類似的效果。在「ギギウ」的例子中，他所遁入的非現實領域，都是他所熟悉的如渡河、斷崖、捕魚與打獵等生活空間與事物，但是終究反映出他內在的張力。此外，實驗者記錄中提到他「許久未曾直視實驗者」，也透露出整個場面的緊張。至於那一段看似不知所云的「打架」宣言，已近乎明白地表達心中的不滿(想打架的話，現在可以打了)！

之後，駐在所警員受藤澤苜委託調查受測者對於實驗的想法，在面對理番警察的詢問時，「ギギウ」回答道：

因為我們高砂族所知有限，所以我誤以為他是來教我們許多

75 藤澤苜，〈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47-367。

事情的。可是結果大出意料之外，他竟然是光聽我們說話而什麼也不教。我真是想不通，所以去問駐在所的職員，他告訴我說，那一位臺北來的老師是來研究高砂族的心理學。請問，所謂的心理學，就是這樣察看別人的言語與行動的學問嗎？

他叫我想出方法來取桌上的花，我想了很多，可是確實不容易取得。這是不是考驗我們的頭腦呢？我很想知道誰的頭腦比較好！⁷⁶

即使帶著一些疑惑，「ギギウ」依然感知到實驗設計所構想的競爭關係。對他而言，殖民統治者所做的實驗，就是想測試自己與族人的頭腦。無論是自己與其他族人的比較，或是自己民族與日本民族的比較，不想在這場競爭中落敗，是其如此努力的原因。因此，激勵他在實驗中一再嘗試的動力，除了想要獲得更多文明的渴望外，還包括了民族之間的鬥爭。類似對於實驗的看法，也出現在其它「トナ」與「マガ」社民的感想中。雖然面對日本警察，許多人口頭承認自己是民族鬥爭中的輸家，然而實驗中不服輸的表現，難道不才是他們真正的情緒？⁷⁷

為什麼要作那種調查呢？實在不可思議！據我個人的猜想，取桌上花的測驗是在調查人的身高。另外，我們高砂族的頭腦要比日本人遲鈍得多；我想，他同時也調查我們頭腦差多少。……⁷⁸

我想他是來調查我們高砂族的頭腦到底靈不靈光。最好的證據是他叫我們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取桌上的花。我們的頭腦

76 藤澤祐，〈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95-396。

77 以下感言，參見藤澤祐，〈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93-396。

78 アリウ，44 歲男性。

和日本人不同，比較遲鈍，所以覺得非常之難。⁷⁹

我認為他是來比較日本人和高砂族的頭腦……⁸⁰

常有來自臺北的老師，調查各種事情，可是這種方式的調查是頭一遭……他把花放在桌上，要我去拿。我不願意落人後，所以想了再想，想出很多方法去拿，比任何人都多，所以論頭腦，我一定是最好的，可以得到冠軍獎。⁸¹

我們高砂族也是人，我想，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會到這兒來，比較我們的腦子和日本人相差多少。他是不是把我們高砂族當作一種毫無知識的，跟貓、狗一樣的人來調查呢？我一點也不知道他的來意，可是現在回想起來，自從我有生以來，從來未曾遭遇如此羞恥難堪的局面……日本人的腦子真夠令人讚佩。他把我們這群毫無判斷力的人，拿去和會做火車、汽車、飛機等東西的聰明人作比較。此事使得我真是羞愧難堪，哪一天，我們才能變得日本人那麼聰明？⁸²

「マスグスグ」的話語，已經可以說是在民族尊嚴受挫的情感下，公然對著殖民警察所發出的憤怒抗議了(自從我有生以來，從來未曾遭遇如此羞恥難堪的局面)。

至於賽夏族、排灣族及部分魯凱族的受試者，則是另外一種典型。實驗者看不到任何想要完成任務的熱情與衝動，他們走進木框之後，多半只象徵性地嘗試幾次，就自己宣告失敗，說些「我不行」、「我不會」、「甚麼辦法也沒有」之類的話語，佇立原地靜待實驗時間的流逝。其不採取行動與自我挫敗的消極態度，甚至把實驗者給惹

79 アタス，32 歲男性。

80 タカナオ，34 歲男性。

81 ギギウ，49 歲男性。

82 マスグスグ，37 歲男性。

急了，而不惜破壞實驗的規定，試圖給被實驗者一些關於解法的暗示。例如，爲了讓被實驗者注意到框內的椅子，以利用它來取花，藤澤苜不得不暗示：

你並不需要一直站下去啊！
這不是要考驗你規不規矩的啊！
盡量放鬆你的身體，好好地想一想！
你不需老是站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這些隱諱的暗示，仍無法達到他想要「引導、認同、並鼓勵受驗者，藉以促其達至當前所需之了解……去引發踏入未分化領域的分化……促其踏上軌道而不後退，更促其達至所能到達之處」⁸³的目的。最後，再也無法忍受被實驗者的藤澤苜，說他自己「索性豁出去了」，而想要一步一步地直接引導被實驗者拿到目標花：

想一想身體的用法！時間經過很久了，你不需要站那麼久！仔細地看一看，那四角形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用那四角形裡面的東西啊！

當被實驗者小聲地自言自語說可以用椅子當拐杖取花，卻又不採取行動時，實驗者「雙手交叉胸前」，似乎有些失去耐性地說：

你說是用什麼東西當作拐杖？
想一想就去做好嗎！

即使如此，受試者依然堅持自己不會，說自己「怎麼去想，都還是不會。做做看，也不會，想拿，可是不會！」⁸⁴

如此消極的態度，也與前述積極類型一樣，讓實驗者受到了「驚嚇」。⁸⁵如前文所述，藤澤苜將此歸因於其文化民族性格強大的禁制

83 藤澤苜，〈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24。

84 藤澤苜，〈高砂族の行動特性(その一)——パイワンとルカイ〉，頁 367-373。

85 藤澤苜，〈高砂族を被験者とする心理學實驗情況、タイヤルとサイシヤ

力量，使其無法挑戰面前的障壁。然而，除了這樣的詮釋之外，這種消極場面的形成，是否也有被實驗者的主動因素在裡頭，以把民族鬥爭的戰場，移到自家領域來進行呢？換言之，面對奇怪的要求，面對不知抱著什麼目的從臺北來到番社的實驗者，這些被實驗者可能抱著猜疑、小心的態度，他們藉著自身的「不行動」，成功地把實驗者引入自己的領域，以觀察他們的反應，分析揣測他們真正的動機與心理。於是，被實驗者成為觀察者，實驗者則成為被觀察的對象。如此主客異位的情勢，其實就反映在實驗者違反自己實驗規定給予提示，以及隨後失去耐性的「情緒反應」中。⁸⁶因此，雖然從實驗結果無法看出原住民的「情緒」，但是藉著「日本人」的情緒，還是可以看到民族之間的鬥爭與張力。

某些事後訪談的記錄，也可以印證上述的詮釋。

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要把我們十個左右的人，一個個分別關進一個房間裡，說是要調查，剛開始的時候，我實在不知道他將問些什麼。捫心自問，我確實沒有做過壞事，所以覺得很奇怪！

真的輪到我被叫進去的時候，卻發現他的調查太簡單了，一時也覺得近似兒戲而有被愚弄的感覺……。⁸⁷

他一定是要測探我們的心，所以才故意放得那麼遠。的確也夠難！⁸⁸

ツト族〉，頁 10。

⁸⁶ 事實上，藤澤祐在其正式發表的學術論文中，並未直接談到自己的情緒。他坦承自己受到「驚嚇」的文章〈高砂族を被験者とする心理學實驗情況、タイヤルとサイシヤツト族〉，是一篇發表於通俗科學雜誌類似實驗雜記的短文。

⁸⁷ ピコシ，35 歲男性。

⁸⁸ パンテル，33 歲男性。這是在酒宴中與同族其它受試者的對話，理番警

……我是第一個接受調查的，事前唯恐他會對我不利，所以一直忐忑難安。⁸⁹

來自臺北的老師在水泥地上化了個圓圈，叫我不跨出圓圈就去拿圈外約有五公尺距離的花。我想了再想，結果還是未能拿到，現在又想，還是拿不到才是應該的！⁹⁰

不論受驗者所用的方法有多麼地可笑，測驗者始終都不動聲色，那種真摯的態度令人敬佩！我覺得大學的老師們果然了不起！

他甚至把掛在教育所辦公室(測驗場所)牆上的年中行事曆也一字不漏地抄走了，這到底是作什麼用的呢？真是令人費解！⁹¹

那是調查我們的心地之善惡，並且的確是在刺探我們竊盜技術之良莠。所以，如果真正想做的話，我想是一定會做的，可是一旦做了出來，一定會以為我是個竊盜能手。那就未免太尷尬了，所以都藉口說不會，沒有真正去做。

他又拿了很多畫畫給我，⁹²其中有看懂的，可是我沒有指出真正的名稱來。⁹³

事實上，即使不考慮殖民鎮壓的歷史經驗，而只考慮當下的殖民關係，甚至只考慮實驗進行的局部情境，我們似乎也能理解被殖民者的情感與表現方式。實驗進行的場所，多半選在警察駐在所或番童教育所。作為番地象徵殖民權力的兩大機構，選擇這樣的場所意味原住

察聽到後把它記錄下來，非直接詢問而得。

89 グロツ，34歲男性。

90 テボサン，52歲男性。

91 リブリブアン，20歲男性。他是實驗中的翻譯，也接受了測試。

92 指藤澤所進行的另一項實驗，Rorschach 圖形測試。

93 チムルサイ，32歲男性。

民對於是否接受實驗並沒有自主的權力。事實也是如此。我們看到有人「連續三天來這裡」，才終於輪到自己接受實驗。試想殖民統治還未穩固的時期，番童教育所的學童還常因家庭勞動力需要而退學，⁹⁴對於一個成年原住民而言，三天的等待時間，將造成多少勞動力的浪費！而且還不只是當地警察機關的介入，來自當時權力中心臺北的老師(先生)的要求，更不可能加以拒絕，總之「不管怎麼說，這是先生要我們做的事，所有人都應該要做。」而或許爲了平衡或掩飾自己對於這種「常有」的調查的不悅，被徵召來的原住民有些還帶著期待，希望可以學習到一些「有益的道理」(或者這是一種實驗後憤怒的轉移發洩，以強調自己不悅的程度?)但一旦開始實驗，原住民卻發現自己陷入了言語與行動被絕對地「察看」的奇怪情境(實在不可思議!)。來自臺北的老師發完指令後，一邊觀察著自己，一邊埋頭在紙上作記錄，原住民被實驗者並不知道自己身體、行動、言語甚至內心的那一部分，正在被「光聽……說話而什麼也不教」的老師「察看」。他們與丹波的被實驗者不同，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心理學，也不知道自己被觀察的結果將形成心理學的知識。這樣子被察看的情境，對於他們而言，只可能是正在「調查」、「考驗」他們被日本殖民者貶爲低等未開化的「頭腦」，或是「刺探」他們是否犯罪的「心」，顯然二者都是令人不悅的情境！假如說丹波的被實驗者是在一再受挫而又受到實驗者嘲諷的情況下，才漸漸累積憤怒的情緒，那麼原住民被實驗者在實驗還未開始之前，或至少在實驗一開始的時候，他們的行動就已受到憤怒的影響(一時也覺得近似兒戲而有被愚弄的感覺)。只是殖民的權力關係，阻絕了憤怒的爆發，憤怒的壓抑與轉移，使得實驗情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競爭的場

94 李佳玲，〈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82。

域。如前文所言的，有些被實驗者讓自己與實驗者展開一場考驗決心與毅力的競爭，他們始終未曾出現實驗者所預期的憤怒爆發，而只是無止盡的努力嘗試，致使實驗者不得不承認挫敗，而必須主動終止實驗；有些被實驗者則是讓整個實驗情境翻轉過來，應該被「察看」的他們，不但不採取任何行動以確保自己的安全，而且還反過來「察看」實驗者的一舉一動，最終激怒了實驗者，使實驗者在這場相互觀察的競爭中，淪為被成功「刺探」的對象。當他們在實驗後輕鬆地稱讚來自大學的老師「始終都不動聲色，那種真摯的態度令人敬佩！」以及提到他們眼中大學老師的行動「令人費解！」時，即使不是帶有嘲諷之意，但是在凝視的科學情境中，他們似乎比實驗者更像是個善於觀察他人言語與行動的心理學家！

對於原住民而言，面對異族統治者的調查與刺探，民族尊嚴受挫的憤怒，雖可能被科學家成功地激起，卻不可能於當下直接爆發。殖民者科學家意圖透過實驗觀察被殖民者的憤怒，卻不知殖民統治的不平等關係，早已阻絕了憤怒的爆發。被殖民者的憤怒只能經過壓抑與轉移，這使實驗者不但陷入一無所獲的窘迫處境，甚至還反過來成為被觀察分析的對象。就這場心理的戰爭而言，雖然是現實戰爭的延續，但是輸贏卻遠不像現實世界中那麼地清楚。

七、總結

一個意圖展現臺灣原住民心理「孩童似的」、「感情中心」、而且容易「憤怒發作」的實驗，最終未能證明它的假設。臺灣原住民不但未如藤澤蒞所預期的那樣，在設計來逼使他們發怒的實驗中失去自我控制，而且從實驗者當下及事後所蒐集的資料來看，他們並不是未曾感到憤怒，而只是壓抑了自己的情緒。因此，藤澤蒞的假設不但未

被證明，甚至還得到了反證。然而，這樣的反證並不意謂原住民「天性」善於壓抑自己的情緒，而必須考慮整體實驗情境的構成及殖民者的在場。

藤澤實驗的假設，顯而易見是種族意識型態的產物。面對必須征服的被殖民者，認為他們缺乏理智、情感多變且易爆發，這既是殖民者的偏見，也是他們對於被殖民者的偏執與疑慮，特別是在發生霧社事件這樣的血腥反抗之後。而且不僅是假設，整個實驗情境其實都是殖民關係的延伸。「從臺北來的老師」在駐在所警察的協助下，命令這些原住民放下手邊的生計勞動，一個個排隊進入木框接受測試。從收到通知開始，一直到實驗結束，甚至在實驗過後，殖民權力不但是實驗得以完成的決定性力量，也是實驗者與被實驗者之間最重要的社會關係。藤澤苜以目標花象徵「日本」，從被實驗者的積極或消極態度，分析他們對於「日本化」與「文明化」的反應。但事實上，早在被實驗者進入木框之前，「日本」作為一種統治與強制性力量就已無處不在。看不到殖民關係對於被實驗者的制約，藤澤苜就看不到被殖民者對於「日本」的真正情感與態度。

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中進行的殖民科學研究，若是以個人行動為觀察對象，莫不受到這樣的限制。殖民實驗者總自以為可以觀察到被殖民者「本然的」、「天性的」行動，他們經常忽略自己的在場，以及整個實驗情境賴以形成的殖民關係，其實才是影響被實驗者行動的決定性因素。這樣的忽略並非必然，其普遍性的存在，讓我們看到殖民者對於殖民關係集體的選擇性遺忘。或許他們無法忍受自己除了作為一種權威與文明的象徵性存在之外，還與被殖民者有著實質的互動關係；也或許他們無法面對自己在被殖民者眼中，可能被賦予的侵略者與壓迫者形象。

此外，藉著重新詮釋藤澤苜留下的詳盡實驗記錄，我們可以對於

原住民心理作出不同的理解。從這些記錄所呈現的原住民行動來看，他們似乎並不是未曾憤怒，只是在體現了殖民權力的實驗情境中，他們的憤怒必須經過壓抑、變形與偽裝。他們有的在憤怒的驅使下，使勁地想要證明自己，以與殖民者一較長短；有的則是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而從殖民實驗者的情緒反應中得到憤怒的實現。無論是殖民者眼中積極追求目標(日本化)的原住民族，或是對於殖民統治柔順服從的原住民族，在殖民者可看見的表面下，似乎都隱藏著一個憤怒的自我。同化統治並未如殖民政府或某些歷史學家所宣稱的那樣，成功改造被殖民者的認同。近藤正己認為霧社事件後殖民政府在理番事業上的變革，收到了卓著的成效。他指出接受「理番政策大綱」指導的理番警察，在同化政策的旗幟下，於番地「宛如赤子地撫育先住民」；⁹⁵同時日本行政力藉著綿密警察網絡侵入原住民文化生活的結果，也破壞了原住民「民族的固有性」與「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因而使原住民不得不主動學習支配者的價值觀，最後並以作為日本帝國一份子的身分，投入帝國的戰爭。⁹⁶然而，從藤澤蒞實驗記錄的被實驗者來看，這樣的說法似乎只描述了原住民自我的一面。在原住民被實驗者與日本實驗者的對峙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自我族群概念，以及對於殖民關係的負面感受。當然我們也必須考慮世代的差異，畢竟實驗中的受試者大多是三十歲以上的成年男性，他們對於日本殖民者的認知，或許與更年輕的世代有所不同。

最後，憤怒不見得只是盲目的衝動，它也可以是一股自覺積極的力量。權以一段同時期日本心理學者關於憤怒的論述，作為本文討論的結語：

⁹⁵ 近藤正己，〈臺灣總督府的「理蕃」體制與霧社事件〉，頁 182。

⁹⁶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臺灣——日本殖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 310。

除了自我欲求受到壓迫妨害可能成為引起憤怒的因子外，理性與倫理欲求受到壓迫時，是否也會有憤怒生成呢？無疑地，這時也會有憤怒發生。……自己的理性與倫理欲求，雖然也是自我主體的欲求，但其實現之處，不在自己而在於普遍的世界。我們只要過著社會生活，就會希望社會能有一定的規範，不只要要求自己也會要求他人。然而，若是社會現實無視此欲求，而加以蹂躪，那時公共的自我就會感到壓迫感與低落感，為了加以防衛而有憤怒的萌生。這是對於公共道德的無視、暴力的壓迫與社會的惡行等所爆發的憤怒。與有關自我的怒不同，這是一種(關乎公眾的)公憤。在倫理人格高度發達與要求社會向善的驅力下，會有這樣憤怒的發生。……作為集團或民族，會存在這樣自存自衛的欲求，並要求其能妥善的實現。然而，在受到其它民族壓迫、妨害、榨取之時，這種共同體的憤怒就會勃然發作，成為民族發動衝突、戰爭與征服的衝動力。⁹⁷

(本文於2006年11月10日通過刊登)

*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深入的評論與建議，感謝陳傳興教授提供余萬居先生翻譯手稿影本，以及傅大為、王文基與劉士永三位老師於研究過程給予的指導與協助。

⁹⁷ 正木正，《行動の心理》(東京：河出書房，1944)，頁279-280。從其形式與內容來看，正木正這本《行動の心理》應是屬於介紹心理學理論的書籍。無論其寫作這段文字時，是否曾想到以此合理化日本發動戰爭的行動，但是心理學對於憤怒確實有著不同層次的探討，而不只將其視為衝動幼稚的暴發行為。只是殖民者對於被殖民者的憤怒反抗，總是很難正視這樣的面向。

Disappearing Anger: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on Anger among Formosan Aborigines Conducted by Fujisawa Shigeru in Late Colonial Taiwan

Yu-chuan Wu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Cardinal Tien Hospital

From 1935 to 1938, Fujisawa Shigeru, then an assistant at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aihoku, Formosa,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on “anger” in various Taiwan aborigine tribes. Fujisawa hoped the experiment, originally designed by T. Dembo, would prove a theory about th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es, namely that aborigines were childish, emotional, and prone to outburst of anger. However, he failed to prove this hypothesis.

This article offer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 The hypothesis portraying Taiwan aborigines as childish and emotional obviously reflected the prevailing racial prejudices of the day. Of all the variety of emotions, Fujisawa’s choice to research anger among aboriginals may also have reflected the fears of colonizers about Taiwan aborigines after the bloody Musha rebellion of 1930. By demonstrating their inclination to outbursts of anger, the aborigines would be condemned as at least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bellion. However, in the experiment aborigines did

not lose their tempers when faced with the frustrating predicament designed to make them angry. Taiwan aborigines seemed even less prone to anger than those highly civilized scholars who became furious in Dembo's original experiment. I suggest that the absence of anger was a consequence of colonial suppression—we need to remember the colonial domination that was indispensable to the proceeding of the experiment, as see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olonial experimenter as both an observer and a symbol of colonial power. As to Fujisawa's interpretation of his findings, which correla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tions of various tribes in the experiment with their differential motivation and efforts at civilization and 'Japanization', as was commonly the case, he neglected the effects of colonization upon the subject in the colonial "human sciences."

Yet in spite of the absence of tantrums, some indications of anger can be discerned in Fujisawa's original records. Anger thus was not absent but was suppressed, transformed or disguised. This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olonized as opposed to the colonizers, and so we cannot sustain the view that assimilationist policies put in place after the Musha rebellion were successful.

Keywords: Fujisawa Shigeru, R. Iinuma, T. Dembo, dynamics of anger, flower-experiment, Musha rebellion, Formosan aborigines